

## “一个德国的隐士”：

### 纪念 Michael Franz 老师（1947-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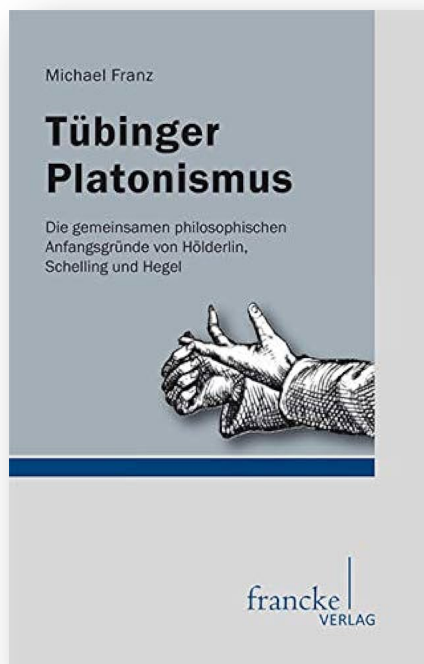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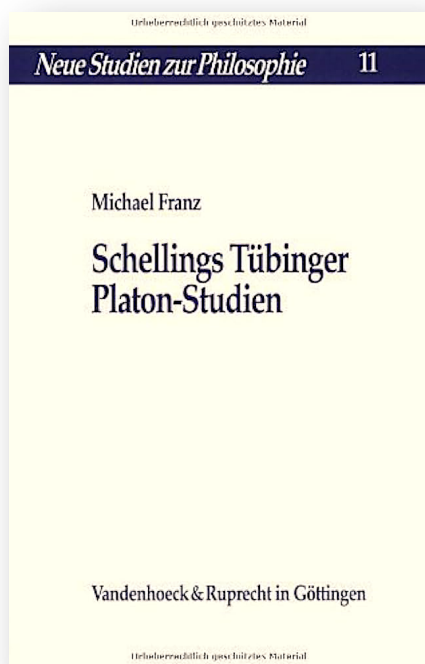
程炜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Michael Franz 老师已于今年7月31日病逝，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是8月17日的深夜，在香港小屋中忽然收到来自 Hayden-Roy 教授的邮件。回忆起 Franz 老师当年对我的种种帮助和支持，几日难以入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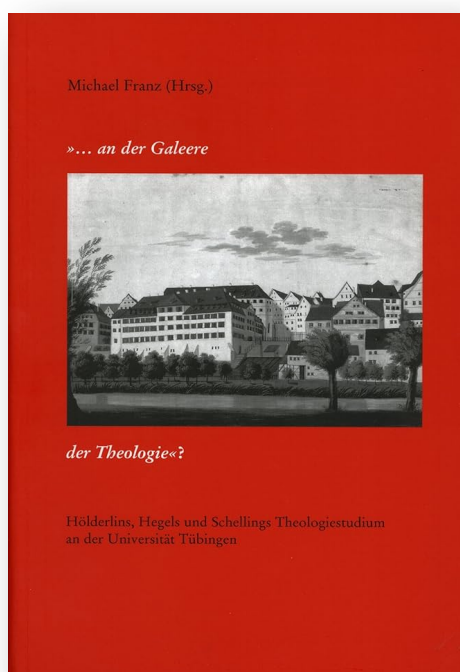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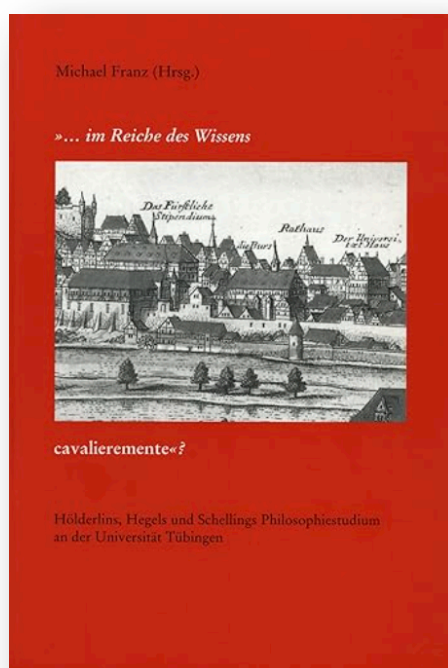
我与 Franz 老师相识于他在图宾根开设的荷尔德林研讨班（“荷尔德林：诗与哲学”），随即两次参与了他组织的希腊/土耳其之旅，之后由于荷尔德林协会的活动也多次在柏林和图宾根相见。可以说，是他引导我进入到荷尔德林的学术研究中。尽管 Franz 主业是研究荷尔德林和早期德国观念论，但实则捻熟希腊拉丁，并且在哲学、神学、日耳曼文学、古典学等多个学科辗转，对各种历史地理掌故了然于胸。尤其是如果聊起荷尔德林，他几乎无所不知。

尽管 Franz 老师是我进入荷尔德林的领路人，也是心中德国老派学人的典范，但他绝非世俗所谓的国际知名学者。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放在教学和辅导学生之上（并非作为官方导师），并且常年参与编纂和整理荷尔德林的文本，“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作为常年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他很少在系内出现；面对热闹的学术界，他更像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尽管当时在图宾根大学任教，他日常住在一个叫 Schiffweiler 的小城。一门课程他常采取两周一次，每次四小时的上法。甚至仅仅在退休前不久，他才从图宾根大学获得一个编外教授的名号。然而，如果以学术标准考量，他又可能曾是最熟悉图宾根神学院相关历史和文本的学者之一，尤其在荷尔德林研究和早期德国观念论领域默默耕耘，做出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研究。我相信多年后其中不少仍旧值得阅读和参考。他的学术贡献或许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首先是德国观念论，特别是其早期发生史的研究。除了汉语学界读者可能相对熟悉的专著《谢林图宾根时期的柏拉图研究》（“*Schellings Tübinger Platon-Studien*”, Göttingen, 1996）——它是作者的教职论文，主要研究早期谢林的《蒂迈欧》笔记——，也包括其姐妹篇《图宾根柏拉图主义：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的共同哲学史基》（*Tübinger Platonismus. Die gemeinsamen philosophischen Anfangsgründe von Hölderlin, Schelling und Hegel*. Tübingen 2012）。这两本专著即可以视为早期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史，也可以视为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在德国的效应史。



(二) Franz 整理、翻译和注解了大量早期德国观念论相关的史料，尤其是 18 世纪末期图宾根神学院教学与研究相关的资料。除了散见于各种杂志和文集的翻译和论文，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主编的三卷本《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的教育史背景史料》（“Materialien zum bildungs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 von Hö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其包括《“修道院确然对我有所助益”：荷尔德林和谢林在尼廷根拉丁学校和符腾堡修道院学校的教育》（*So hat mir das Kloster etwas genützt* : Hölderlins und Schellings Schulbildung in der Nürtinger Lateinschule und den württembergischen Klosterschulen, Ed. Isele, 2004）和《“...骑士般地在知识之王国?”：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在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学习》（“... im Reiche des Wissens cavalièrement”?: Hölderlins, Hegels und Schellings Philosophiestudium an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Ed. Isele, 2005）以及《“...在神学之舰?”：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在图宾根大学的神学学习》（... an der Galeere der Theologie?: Hölderlins, Hegels und Schellings Theologiestudium an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Ed. Isele, 2008）。这三本书除了包含相关主题的研究论文外，收入了大量珍贵史料和档案信息（拉丁文通常会给出德文翻译）。如果读者想知道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参与了哪些课程，相关讲义的内容，受到哪些老师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考试和答辩等问题，这三卷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引导。也正是在同一语境下，Franz 同时用心研究了当时图宾根神学院的多位重要学者，包括 Johann Friedrich Flatt、Christian Friedrich Schnurrer、August Friedrich Bök 等。他尤其重视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Gottfried Ploucquet (1716–1790)，在 2006 年整理翻译和注释了其《逻辑学》（Logik）讲义（Hildesheim, Zürich, New York 2006）。



(三) 相比于德国观念论, 荷尔德林的研究占据了 Franz 的整个研究生涯, 甚至可以说定义了他的人生。他不仅是这位诗人的仰慕者、研究者和编纂者, 通过荷尔德林协会 (Hölderlin-Gesellschaft), 也是这一诗人相关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重要的组织者。事实上, 他告诉我, 自己在中学时期就痴迷于荷尔德林的诗歌, 并打算以其研究作为终生的志业。但与大多数荷尔德林学者不同, Franz 既没有以日耳曼文学 (Germanistik) 开始自己的学业, 最后获得也是哲学, 而非文学博士学位。这其中既有必然, 也有偶然。一方面, 深受学习神学和医学的父亲

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 Franz 就瞧不起文学系的肤浅。他一开始选择了新教神学作为大学的主修专业(哲学辅修), 既是为了恰当把握荷尔德林本人的神学背景, 也是为了学习在圣经研究中颇为成熟的历史-语文学方法。他告诉我, 在图宾根的这段学习, 他尤其受到圣经考据学者以及系统神学家 Eberhard Jüngel 等人的影响。硕士毕业后, Franz 确实又在苏黎世大学的日耳曼文学系注册, 其目的是追随著名的荷尔德林专家 Wolfgang Binder 写作博士论文。然而由于 Binder 中途不幸生病, Franz 再次转到了 Saarland 大学哲学系, 在黑格尔专家 Karl-Heinz Ilting 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业。不难看出, 恰恰因为荷尔德林, Franz 在神学系、哲学系和德语系之间游走求学, 最终以荷尔德林的思想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 论文题目为《系统及其熵: 荷尔德林著作中的“世界”作为哲学和神学疑难》(*Das System und seine Entropie. Welt als philosophisches und theologisches Problem in den Schriften Friedrich Hölderlins*, 1978, 未出版)。而他生前最后一本专著——2020 出版的《异时之异思: 荷尔德林在“品达残篇”中对于法权与政治的最终之思》(„...und anderes denk in anderer Zeit...“: *Hölderlins letzte Gedanken zu Recht und Politik in den „Pindarfragmenten“*. Berlin)——则重新回到这位诗人。在这中间, 他虽然未曾出版荷尔德林的研究专著, 但研究论文不断。同时, 作为几套荷尔德林文集和丛书的重要编辑, 他也在相关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当然需要提及的是荷尔德林法兰克福版 („Frankfurter Ausgabe“, hrsg. von D.E. Sattler) 的编辑。在这套不仅改变了荷尔德林研究, 甚至改变了德国近代文学学校勘本出版模式的丛书中, Franz 负责了四本分卷的工作(第 9 卷、第 15-17 卷), 其中包括难度极高的“品达残篇”以及“理论作品”。之后, 出于对 Sattler 主导的法兰克福版的不满, 他又与 Michael Knaupp 一同编辑了荷尔德林的慕尼黑版 (*Friedrich Hölderlin, Sä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München 1992), 这套小巧但校勘精当的作品同样受到普通读者和学界的青睐。



荷尔德林法兰克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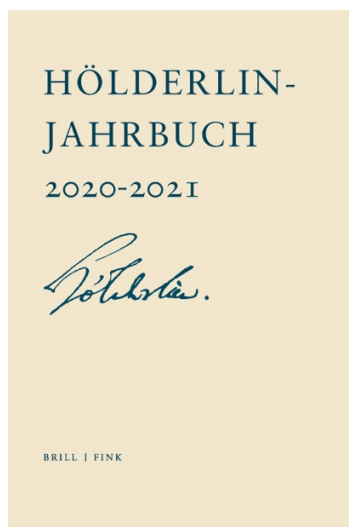
荷尔德林慕尼黑版

除了荷尔德林作品的编订校勘, 他也长时间参与编辑《荷尔德林年鉴》(*Hölderlin-Jahrbuch*) 和“荷尔德林-纹理”系列 (“Hölderlin-Texturen”)。前者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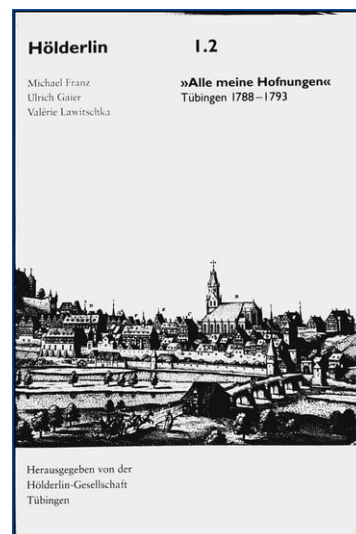
荷尔德林协会的会刊, 也是当前唯一以荷尔德林为专题的杂志; 后者则是从历史角度全面介绍荷尔德林的生平、作品以及社会环境, 包含有大量重要史料和精美的图片。



《异时之异思: 荷尔德林在“品达残篇”中对于法权与政治的最终之思》



《荷尔德林年鉴》



“荷尔德林-纹理”卷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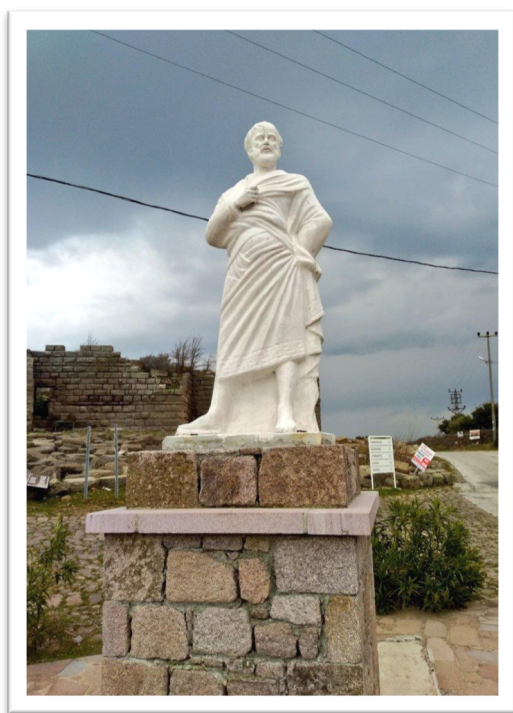
Franz 上述三个板块的研究不仅贯穿他生命的始终, 而且彼此紧密联系。在教职论文《谢林图宾根时期的柏拉图研究》时, 他就发现了柏拉图阅读对于早期图宾根三杰, 甚至德国观念论起源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图宾根神学院教学、藏书以及教员作品的发掘, Franz 敏锐指出, 我们不能轻易将 19 世纪末期的柏拉图形象等同于数年后受到施莱尔马赫解释学革命影响的柏拉图形象。相比于后者以对话录的形式和教导为中心的解读, 前者仍旧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 更致力于系统的灵魂论、形而上学和神学。正如 Franz 始终坚持历史-解释学并行的研究方式, 在本书中, 他除了展示图宾根时期的谢林如何将柏拉图接受与康德/莱尔霍尔德 (K. Reinhold) 的批判哲学相互联系逐渐开拓出自身的哲学道路, 在附录部分, Franz 也初步整理发表了早期谢林的两篇笔记, 即所谓的“诗人’论文” (《Dichter》-Aufsatz) 和“柏拉图哲学的形式” (For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

后续的《图宾根柏拉图主义》可以看做上一研究的继续, 只是研究的视野从谢林明确拓展到了三杰, 尤其是荷尔德林。与 Dieter Henrich 对于荷尔德林开创性的研究类似 (尤其参《语境中的黑格尔》[*Hegel im Kontext*] 和《意识中的奠基: 对荷尔德林 1794/95 思想的研究》[*Der Grund im Bewusstsein: Untersuchungen zu Hölderlins Denken (1794/95)*]), Franz 也力主提升荷尔德林作为哲学家 (而不仅仅是诗人) 的位置, 尤其看中他对于早期黑格尔的影响。同样类似于 Henrich, 他既反对将荷尔德林视为单纯的诗人, 也反对狄尔泰等学者尽管重视荷尔德林的哲学, 但却将对德国观念论的贡献限定在美和美学之上。不过不同于 Henrich, Franz 并不认为早期荷尔德林的重心在于所谓的统一性哲学 (Vereinigungsphilosophie), 无论这种统一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综合, 还是实践意义上协调爱与个体的冲突。呼应了图宾根学派对于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挖掘, 即所谓学园内部强调“限定性之一”与“不定之二”本原学说, Franz 认为早期荷尔德林试图寻找的其实是一种本原理论 (Prinzipienlehre), 其试图阐发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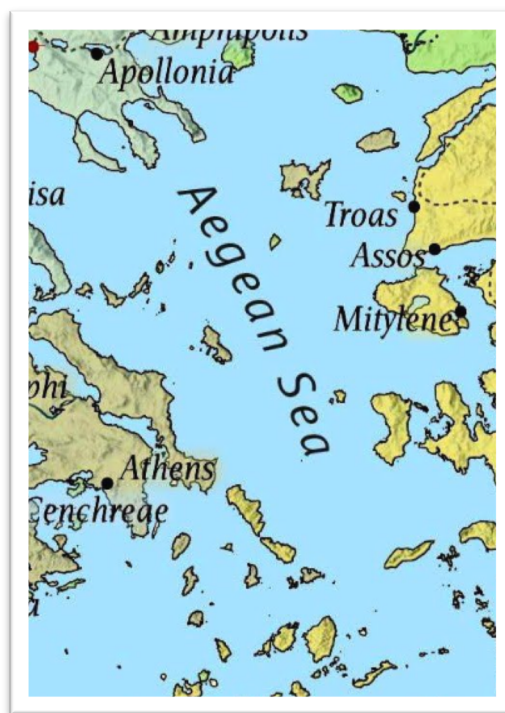
各个领域分裂的原因以及给出克服这一分裂的解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不少学者都发现了德国观念论与柏拉图主义——甚至与柏拉图本原学说——的密切关联, 但他们的工作或者集中于中后期成熟著作的比较研究(例如 Werner Beierwaltes), 或者集中在黑格尔身上(如 Jens Halfwassen, 尤其是他的专著《黑格尔与晚期古代的新柏拉图主义》(*Hegel und der spätantike Neuplatonismus: Untersuchungen zur Metaphysik des Einen und des Nous in Hegels spekulativer und geschichtlicher Deutung*, Bonn 1999; 2nd edition, Hamburg 2005))。与之不同, Franz 更用心于谢林和荷尔德林, 尤其是他们的求学时期。回到荷尔德林本人, Franz 的解读不仅建立在对于出版文本的细读之上, 他特别通过引入荷尔德林的书信、草稿、参与课程和阅读材料等, 证明小说《许佩里翁》(Hypeirion) 中的知名意象“偏离中心的轨道”(exzentrischen Bahn) 需要采取一种数学解读, 即指向由限定的圆和无限定的直线结合构成的螺旋曲线。它一方面分别象征了人性对于两种矛盾倾向——封闭和无限扩展的汇聚; 另一方面则暗示, 尽管理想的人性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归, 但绝无可能回到原初的起点。Franz 指出, 这一线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荷尔德林早期的文学和哲学创作, 并且可以视为图宾根柏拉图主义的产物, 它尤其受到当时神学院数学教员 Christoph Friedrich Pflaiderer (1736–1821) 的影响。Pflaiderer 是 19 世纪重要的欧几里德《几何原理》研究者之一, 他不仅重新注释了《几何原理》, 而且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本原理论传授给图宾根神学院的学生们, 包括 Proclus 结合了柏拉图本原学说的《〈几何原理〉注》。

上文提及的两部专著不仅从理论上, 也从历史角度揭示了德国观念论的柏拉图主义起源。如果说这些研究展现了 Franz 善于结合未发表的档案材料和出版著作的历史-语文学研究径路, 他同时, 正如之前提及的, 也更是身体力行地编辑和整理大量的相关史料。换句话说, Franz 不仅提供了以历史-语文学方式进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范例, 而且更是通过整理和发掘文献的方式邀请后来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去挖掘相对较少人涉足的宝藏。如果说近些年, 尤其是英美的哲学史研究者重提“语境主义革命”(The Contextualist Revolution, 这一说法以及相关争论参 Christia Mercer (2019). 'The Contextualist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57 (3): 529-548), 那么这一工作 Franz 本人不仅一直亲身实践, 并且留下来了大量的宝矿可以供后人利用和发展。他曾经跟我说, 自己对于“世界的结构和本质”这样的问题并不直接感兴趣, 也无力探究, 但却非常感兴趣他人对此的看法和理由; 于是, 历史考证径路的哲学史研究自然成为不二之选, 对此的探究就像侦破一个个案件般有趣。据我所知, 他生前还多年用力于符腾堡公国 (Herzogtum Württemberg) 政治史研究。他多次对我强调, 在德国统一之前, 我们需要关注德意志各邦国的“地方”史; 而了解符腾堡公国在 18 世纪末期的政局变化对于了解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等人政治观念的形成和演化必不可少。他们笔下的祖国往往首先是符腾堡公国, 而非尚未统一的德国; 不仅三人密切关注时局, 而且他们的一些朋友甚至直接参与到符腾堡的立法与改革工作, 反过来对三人又产生了深刻影响。2021 年, Franz 写信告诉我自己已经积累了上千页的手稿, 既包括自己的研究也包括史料汇编。然而, 他的突然去世极可能让这份宏大的研究永远无法问世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Franz 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局部反映在生前的最后一部专著——《异时之异思: 荷尔德林在“品达残篇”中对于法权与政治的最终之思》——之中。这本书不仅对荷尔德林的奇文“品达残篇”提供了最新注解, 也透过符腾堡公国历史与荷尔德林的文本交互, 提供了对这一文本的一种政治哲学解读。

除了上文提及的领域, Franz, 如传统的德意志学人一般, 始终钟情于古希腊, 尤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 这也是他退休前多次组织希腊之行的缘由之一。我分别参与了其中两次, 它们的主题——“许佩里翁之旅”和“荷马与 Lesbos”——或许就足以揭示 Franz 老师对希腊的热爱。每次旅行包括远足和研讨班两部分, 参与者既包括一些资深教学学者, 例如图宾根的医学史教授 Gerhard Fichtner (他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整理的版“希波格拉底与盖伦文献目录” [Bibliographies to Hippocrates and to Galen] 迄今也十分有用), 知名的荷尔德林和策兰专家 Bernhard Böschstein, 也包括一些荷尔德林的爱好者和学生。Franz 除了很早就策划安排好所有路线和设计课程大纲之外, 并且总是为学生争取最低的参与费用 (我们第一次的“许佩里翁之旅”两周时间参观了小说中涉及的所有主要地点, 记得学生只需要提交 600 欧元左右的费用, 包括住宿和交通)。而第二次希腊之旅, 除了在 Lesbos 岛 (品达和 Theophrastus 的故乡) 参与荷马课程和参观特洛伊遗址, Franz 也刻意安排我们在 Assos 停驻, 因为这里是传说中亚里士多德和 Theophrastus 共同研究动植物的地方。尽管当时我已经决定写作亚里士多德主题的博士论文, 但从没有想到自己会跟 Theophrastus——他的亲密学生、合作者和继承人——有任何学术关联。甚至如果不是 Franz 把我带到 Assos 参观并且讲述这段历史, 我对亚里士多德游历时期的具体认识可能会更晚。直到 2013 年之后, 大概博士论文写作的后半段, 我才越来越意识到漫步派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性, 并且自己不得不开始阅读和处理一些 Theophrastus 的材料。



Assos 的亚里士多德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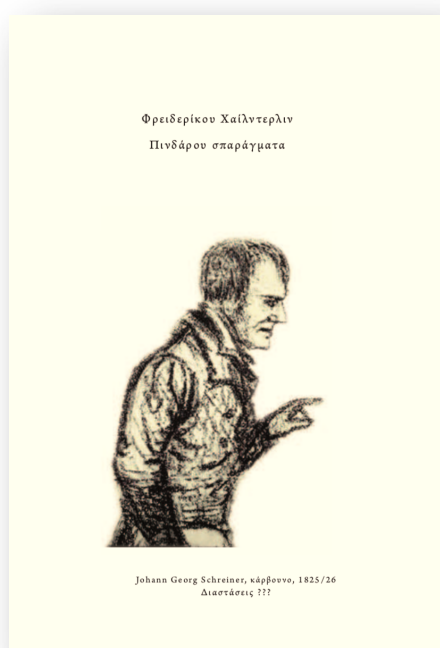
Assos 和 Mitylene (in Lesbos)

回国后, 我偶而与 Franz 老师通信, 除了询问荷尔德林相关的问题, 有时彼此也交换论文。同时, 我开始将博士论文写作时收集的边角料扩充为论文, 其中就包括两篇都是以 Theophrastus 为主题。我也特意跟 Franz 提到过这些, 并且将草稿发给他。2021 年, 新冠正在欧洲肆虐, 我写信询问他的身体状况, 他请我安心, 因为自己已经打了疫苗, 并且就像“德国隐士” („Der Eremit in Deutschland, 戏拟荷尔德林《许佩里翁》的副标题“希腊的隐士” [„Der Erem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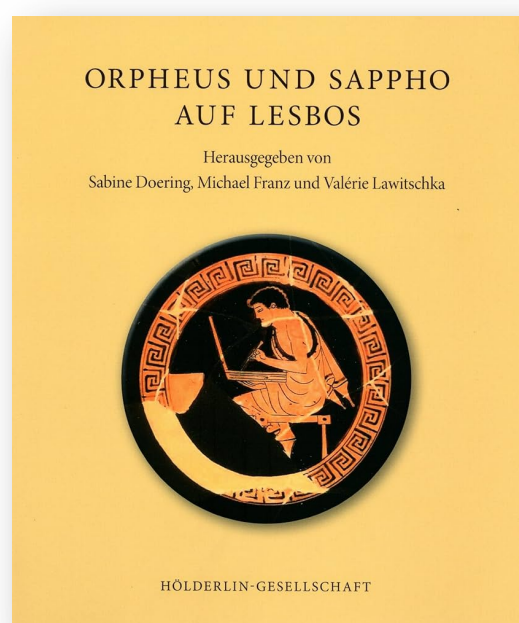
in Griechenland“]) 待在乡村家中足不出户，全身心投入在学术研究之中。他的研究内容既包括对于荷尔德林《品达残篇》的后续思考，也包括符腾堡公国的政治史。而就在同年 12 月，他写信给我（未曾想到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对你写的关于 Theophrast 的文章很感兴趣。正如你所知，Theophrast 是一个 Lesbos 岛人，而这个我已经两年没有去过的岛是我最爱的地方。（2022 年我还敢再飞去那里吗？）。我的朋友 Antonis 一年半前（因胰腺癌）去世了——我万分想念他！”

Antonis 是 Franz 老师多年的挚友，一位荷尔德林爱好者，也是荷尔德林诗集的希腊文译者之一。同时他在希腊经营一个小的印刷厂，出版过荷尔德林相关的画册等。而我们的每次希腊之旅都受惠于他精心的组织和安排。他的意外去世或许让 Franz 老师消耗了太多的心神，也就两三年后随他一同离开了。



Antonis 翻译的荷尔德林《品达残篇》



Franz 等人编辑的关于 Lesbos 岛的文集

八月得到 Franz 老师去世的信息时，我连忙发邮件给正在排印我第二篇 Theophrastus 论文的编辑，问他能否在致谢中增加一个给刚刚去世的 Franz 老师的题献。杂志主编同意了请求。前两天，这篇文章终于正式上线。它不仅关于 Lesbos 岛人 Theophrastus，也讨论了 Franz 老师感兴趣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希望这对他在天之灵是一些慰藉。



Die Hölderlingesellschaft trauert um ihr Ehrenmitglied

**Prof. Dr. Michael Franz**

1947 - 2023

**Vizepräsident der Hölderlin-Gesellschaft von 2006 bis 2018**

Mit Michael Franz verlieren wir einen leidenschaftlichen Wissenschaftler, einen beeindruckenden Kollegen, einen Spezialisten mit immensem Wissen zu Werk und Wirkung Hölderlins und nicht zuletzt einen engagierten und treuen Freund, dem die Hölderlingesellschaft immer eine Herzensangelegenheit war.

Er wird uns fehlen.

Prof. Dr. Johann Kreuzer  
Präsident

**Hölderlin**  
Gesellschaft

Vorstand und Beirat  
der Hölderlingesellschaft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Samstag, dem 26. August 2023, 14.00 Uhr  
i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n Landsweiler-Reden statt.

荷尔德林协会发布的讣告